

●张觉

《韩非子》校后记

校书之事，相互僻对而已，过去一直未知其难。今校《韩非子》，始知诚非易事。其难，不仅在学识之积累；实亦在于版本及有关资料之寻觅。若未见原本原书而草率从事，人云亦云，则难免以讹传讹，贻误后学。我校完《韩非子》，对此感触颇深。现不防稍举二三，以见校书之不易。

《说疑》“为人主者”一句，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以下简称《识误》）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当作‘臣’。”顾氏所谓“今本”者，乃指吴郡赵用贤于明万历十年（1582）所刻之《韩非子》。取赵用贤本一看，便知顾氏所云，乃指乾道本（实为吴▲本）“为人主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之“主”而言，而非指“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中之“主”而言。然而王先慎作《韩非子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时，见顾校列于“为人主者”一语之下，竟不复核赵用贤本而郢书燕说般地依顾校将后者之“主”改为“臣”，失谬殊甚。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以下简称《集释》）虽力辨王改之误，但仍将顾氏之校语列于“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之“为人主者”下。这实际上重蹈了王氏之覆辙。因为两者结论虽不同，但未用赵本校对而误解顾校的错误实是相同的。诚然，若取赵本校过，便可知顾氏非指此句的“为人主者”而言，故不当将顾校列于此；如果顾氏真是指此句而言，则失校殊甚，当以赵本正之。现既列顾校于此，又未辨顾校之失，那就未免

与王氏一样失校了。再看梁启雄的《韩非子浅解》（以下简称《浅解》），虽亦力纠王改之失，但说“《集解》从今本改乾道本‘人主’作‘人臣’”，则其浅陋又不言而喻了。因为《集解》乃误会顾校而改，根本不是“从今本”而改。《浅解》又云：“今改从乾道、《迂评》、《翼毳》等本”，唯独不以赵本正其是非，这又是为什么呢？此两家校勘，皆云取资乎赵用贤本，然皆于赵本茫茫然而不知以赵本正王氏之误，则校书之不易诚可见矣。

《外储说左上》“虞庆为屋”一节，顾广圻《识误》曰：“今本‘虞庆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误。”王先慎亦依顾氏所云而改。殊不知今本初刊后又刻改过一次，早在“涂濡而椽生”之后补入了“虞庆曰不然”五字（为双行小字），只不过“此宜卑”之下忘删此五字而已。今既以赵本校过，《浅解》竟不知王改之失，而《集释》虽悟其误，亦未知以赵本正之，校勘之不易又可知矣。

《说林下》：“卜吉乎？曰：吉。”《集解》云：“《四部丛刊本》卜吉下空三格，明宋本原有三字而坏去者。”其实，四部丛刊本于“卜吉”下有“乎曰吉”三字，只是黄丕烈以宋本相校时将此三字改成了“□□□”。这说明述古堂影宋抄本并不是“空三格”，只有宋本原刻才“空三格”，后人若不以原本相校，则必为《集释》所误。

《外储说左上》：“且为下走睡卧。”《集解》云：“《藏本》作具为下，具即且之

误。”其实，道藏本根本不作“具”而作“且”。

《外储说左上》：“臣为削者也。”《识误》曰：“藏本臣下有为字。”《集释》却云：“今藏本无为字。”今核查藏本，有“为”字，真不知《集释》据何藏本。

《外储说左上》：“王曰：吾欲观见之。”《集解》曰：“各本无王曰二字，卢文弨云：‘《文选》注有王曰二字。今据补。’”《集释》亦云：“各本无王曰二字，卢文弨云：‘《文选》注有王曰二字，是也。’今据补。王先慎亦从卢说补。”其实，吴鼒所仿刻的乾道本即有“王曰”二字，四部丛刊本、道藏本也都有“王曰”二字，只是赵用贤本、迂评本无此二字，《集释》不校各本而误从《集解》为其校说，得无憾乎！《集释》自称“以宋乾道黄三八郎刊本（简称《乾道本》）为主”，今宋原刻本无存，已足知其诬，而以此例观之，料其甚至未用学术界所公认的善本吴鼒本校过。

《功名》：“则临千仞之墉。”《集释》云：“吴鼒本作十。”其实，吴鼒本原作“千”。《内储说下》：“泰种尝贵甚。”《集释》云：“尝，吴本误作常。”其实，吴本作“尝”不误。《外储说右下》：“今身使佚。”《集释》云：“吴鼒本今误令。”其实，吴鼒本作“今”不误。可见，其根本未用吴鼒本校过。再如《内储说下》：“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集释》云：“迂评本作尝”其实，迂评本不作“尝”而作“常”。从上述几例来看，《集释》似乎并未真正用乾道本、赵用贤本、四部丛刊本、迂评本、道藏本等认真校过，而只是依据他人校说或以后世之各种翻刻本来作校勘。人们常以《集释》为《韩非子》校本之典要而加以引用，或者不宜乎！

当然，此类失误不限于《集释》。如《喻老》“不欲自害”一句，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将此改为“不

以欲自害”。其校记云：“乾道本‘不’下无‘以’字，据道藏本补。”其实，道藏本根本没有这个“以”字。

《内储说下·说五》“一曰：楚成王商臣为太子”之文，《校注》于“王”下补“以”字。其校记云：“据赵用贤本、凌瀛初本补。”其实，赵用贤本也根本无这个“以”字。

《难一》：“虫出尸不葬。”《校注》改“尸”为“户”。其校记云：“乾道本‘户’作‘尸’，据道藏本改。”其实，道藏本也作“尸”。

《校注》之校记说《主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道藏本有此“得”字；说《外储说左上》“辩以羽翠”之“羽”，赵用贤本作“翡翠”；说《难势》“则亦不然矣”中的“不”，道藏本也有；说《难势》“两未之议”之“未”，张榜本作“末”；此皆误校之词。

以上所举，只是版本相校之失，至于引用他人校说处，则各书不慎处尤多。

如《内储说下》：“庙攻”。《集释》云：“何祚曰：《六微》内亡去三章，其《废置》章亦残缺不全，而未尝言及《庙攻》章。此盖后人因章中有‘此谓庙攻’之语，妄意割裂以添此章名耳。今谨考正以复旧章。”其实，何祚根本没有此言，也未“考正以复旧章”。据《韩子迂评》所载的何祚校《韩子》序可知，何祚之言为：“又第十卷《内储说下六微》内亡去《似类》一章、《有反》一章、《参疑》一章，其《废置》章亦有残缺不全。与处士臣谦家藏本无异。今因之，不敢妄为增定。”今考各书，可知《集释》乃抄袭陈启天《韩非子校释》（以下简称《校释》）所录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之语而致误。《校释》云：“《纂闻》云：‘案上总叙六微，止言六曰故国废置，而无庙攻之目。’何祚序云：‘《六微》内亡去三章，其废置章亦有残缺不全，而未尝言及庙攻章。此盖后人因章中有此谓庙

攻之语，妄意割裂以添此章名者耳。今谨考正，以复旧章。”《校释》如此标点，《集释》未参阅何祚序，因以致误焉。

《集释》因抄袭《校释》而致误者甚多，不防再举几例。如《和氏》：“绝灭百吏之裸秩。”《识误》云：“绝灭当作才减。”《校释》误为“绝灭当作才灭”，《集释》便因袭其误。

又如《说难》：“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校释》云：“《增读》云：‘交，交杂也。’按交字疑为驳字之误，谓驳杂也，……《博校》云：‘交，《说文》：交，交胫也。按交亦有错杂之义，……此处作动词用，错杂也……作驳亦嫌曲解。’”《校释》所谓《增读》，即蒲阪圆《增读韩非子》，而所谓《博校》，是指傅佛崖读了他的《韩非子校释》后所作的按语（《校释》所列“引用书目简名”中题为“傅佛崖《校读韩非子校释》初稿”），所以陈启天将其说附于自己的说法之后。《集释》不知此中原委而加案语曰：“蒲阪圆以为驳字之误，亦不确。傅佛崖以交系作动词用，错杂也，亦不可解。”以陈启天之说为蒲阪圆之说，盖以为《校释》所引他人之说必先于《校释》，以至于不顾《校释》之标点而致误。当然，此类误会，恐为弄巧成拙所致。详考《集释》，该书多抄袭《校释》而又尽力避去《校释》之名，以示已之荟集发明之功，故在其“引用诸家校说列目”中不但不提《校释》，而且将傅佛崖之作改题为《校读韩非子初稿》。

《校释》引用他人之说只题书名而不题人名，而《集释》改题人名，这亦难免会失误。如《十过》：“夫以实告我者秦也。”《校释》云：“《点勘》云：告，当是害之坏字。”《点勘》即吴汝纶的《点勘韩非子读本》，故《集释》改题为“吴汝纶曰”。殊不知此虽出自《点勘》，却为“吴闇生”之校语，凡此种种，读者细加考校，便可知其

底细，于此不再赘述了。

除《集释》外，他书也有类似的情况。

如《南面》“事有功者必赏”，《校注》改为“事有功者不赏”，其校记云：“顾广圻说：‘当作事有功者不赏。’今据改。”其实，顾氏《识误》本曰：“当作‘事虽有功不赏’。”哪里说“当作‘事有功者不赏’”呢？

《外储说左上·说三》“夫卖庸而播耕者”一句，《集释》云：“松皋圆曰：卖，买误。”《校注》之校记与《集释》一字不差。殊不知松皋圆《韩非子纂闻》已改“卖”为“买”，且曰：“买，元作卖，误。”

《十过》“奚谓内不量力”一段之“夫以实告我者，秦也”一句，《集释》云：“吴汝纶曰：‘告当是害之坏字。’”周钟灵等《韩非子索引》之校记照抄《集释》，殊不知该语虽出自吴汝纶点勘之《韩非子》，但该按语之前“男闇生谨案”五字粲然夺目。今张冠李戴，其疏漏不言自明。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此观之，则校书者务必以取原本原书为可贵。征引第二手材料，人云亦云，将不免有失，后来，我又校《商君书》，发现不用原本原书之校勘者不乏其人。如高亨《商君书注译》，其《叙例》虽云：“本书所录《商君书》本文乃用严万里校本。”其《校释书目》还说朱师辙《商君书解诂》的“文字及标点多误”。但据我校对所见，则《注译》之正文并非录自严校本，而是抄自《商君书解诂》。故《解诂》文字之误，《注译》亦误；至其未误处，又有失误。大概因为《解诂》以严校本为底本，《注译》抄自《解诂》，所以亦就袭称以严校本为底本。据第二手材料，往往会觉得地失误，这实为校书之大戒。校书必取第一手材料，这应成为校书者之座右铭，笔者愿以此与校书者共勉。有感于此，今将有关《韩非子》的一些主要的版本与校释之作略

作介绍，以供校勘者及其他研究者参考。

一、“乾道本”。这是习惯上所称之“乾道本”，其实只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吴鼐所刊之《乾道本韩非子廿卷》。我所见者为全椒吴氏四世学士祠堂藏板。该书之底本，乃南宋乾道改元（1165）时黄三八郎所印。南宋之原印本，今已亡佚。今世之校释者多自称以宋本校勘，皆不足信。清代吴鼐曾借得宋本，使人影抄一部，后以该影抄本付梓，题为《乾道本韩非子廿卷》，因习称“乾道本”。若究其实而正其名，当称为“吴氏仿宋刻本”才较准确，因为其中有很多文字已经校改过了（此书由顾广圻负责校刊，可能是顾广圻所改）。此本《显学》篇末有脱文，然大体完整，乃学术界公认之善本。后来翻刻者甚众，影响最大的要数浙江书局本。浙江书局于光绪初年刻《二十二子》，其中的《韩非子》刻于光绪元年（1875），即据吴氏影宋乾道本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过《二十二子》，所以此本现在十分容易见到）。此本将乾道本之楷体易为老宋体，故宋本之迹荡然无存。该本与吴鼐本相校，在文字上颇有出入，所以不足称道。因为它出自吴鼐本，而且比吴鼐本容易见到，所以常被人们当作“乾道本”来使用。例如，王先慎说他的《集解》“以宋乾道本为主”，我们只须互校一下即可明了，《集解》之文字实多出自浙江书局本，故其误往往相仍。甚而至于后世刻书者，亦有将浙江局本当作吴鼐本来使用的。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编印《四部备要》，其中的《韩非子》虽云“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刊”，但据我所校，知其乃据浙江局本校刊，故其相承之误更为突出，如《解老》“树木有蔓根”一句，浙江局本于“树木”上误衍“树木”两字，四部备要本竟亦误重两字。四部备要本之具体校对不可谓不认真，但据第二手资料来相校的基本态度却显然很不严

谨。其实，既据“浙江局本”刻出，何必一定要说是“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刊”呢？这种以第二手版本资料为第一手版本资料的不良习气，在校勘界实已成风。据我所见，《韩非子》的校勘之作，大多如此。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二、四部丛刊本。此即1919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韩非子》。该书之底本，亦为乾道黄三八郎印本，不过经过影抄，文字不免有出入。黄丕烈曾用宋本校过，故书眉上有黄氏手迹，该本文字虽与吴鼐本不尽相同，但皆影抄自宋本，所以两本之版面（相应页次的行数、字数等）基本一致，保留了宋本之面貌，故为校勘学家所重。之所以不称“乾道本”而习称“四部丛刊本”，实是为了与习称之“乾道本”（吴鼐本）相区别而已。

三、道藏本。这是指1925年2月上海涵芬楼影印的明正统十年（1445）所刻《道藏》中的《韩非子》。《道藏》中所收《韩非子》二十卷隶于“太清部”，其函次为“匪一”至“匪十”（载前十二卷），“亏一”至“亏七”（载后八卷），装订于第846至849册。该《韩非子》乃缺刻本，脱去文字不少，连《奸劫弑臣》、《说林下》之篇目亦脱去了，故又称为“五十三篇本”。因其刊于明代，所以也为校勘家所重。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3月据涵芬楼影印本影印了《道藏》，《韩非子》装订于第27册，这样道藏本《韩非子》就更易见到了。

四、迂评本。这有初刻与重刊之别。初刻《韩子迂评》刻成于明万历七年（1579）三月。该书之底本，乃元代何祚、许谦所校之元皇朝内府藏本。何祚原本今已失传，万历六年吴郡门无子得之，订正品评后由陈深负责刊印。上述浙江书局本、四部丛刊本、道藏本都甚易见到，吴

蔚本也不难寻觅，而这迂评初刻本现在却甚罕见了。该书首载陈深万历六年十二月所写《韩子迂评序》，次为门无子摄提孟陬所写之《刻韩子迂评序》、何犹至元三年序、门无子万历己卯三月记、《韩子迂评目录》。书末有附录六篇以及茅坤的《韩子迂评后语》。此本亦为五十三篇本，与道藏本相类。万历十年赵用贤本刊行后，陈深依赵本对初刻本作了订正补充，于万历十一年重刊，其重刊本篇目虽仍为五十三篇，正文却已据赵本加以补足。如卷四补了三叶，卷七补了四叶，卷十补了八叶。但所补处也有粗疏的地方，如卷七补了第13叶到第16叶，但第17叶（初刻本为第13叶）首行却忘删了“焉”字。除正文补叶外，其文字亦与初刻本不尽相同，如初刻本“世学者说人主”一句（《奸劫弑臣》），重刊本依赵用贤本改成了“世之学术者说人主”。另外，重刊本在书前插入了《重校韩子迂评引》和《重校韩子迂评凡例》，又在书口下端仿赵用贤本增加了刻工姓名。重刊本依赵用贤本改了，所以其校勘价值反不如初刻本，实可略而不论。《韩子迂评》亦有翻刻本，较易见到的有一种硃评套印本。其文即依万历十一年刊本刊出，又增加了汪南溟、赵定宇、张宾王、孙月峰等人的评语。它只是一般的文学读本。

五、赵用贤本。即明万历十年（1582）吴郡赵用贤所刻之《韩非子》。因其与《管子》合刻，故又称“管韩合刻本”，顾广圻则称之为“今本”。此本乃以宋本为底本，又据道藏本、迂评本等改定补足。此书刻印精致，初刻后又刻改过，补进去的文字皆为双行小字，甚易与注文相混。乾道本、道藏本、迂评初刻本都有缺失，唯独赵本为足本，故一问世即享盛誉，翻刻者甚众，如周孔教本、聚文堂“十子全书”本等。至于吴勉学刻“二十子全书”本、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种”本，则将赵

本的注也删去了。现在赵用贤本不难看到，所以这些翻刻本便可置而不论了。至于《四库全书》中的《韩子》，据周孔教本抄录，再校以赵本，故亦可略而不论。明万历时张榜芟弃赵本所成之《韩非子纂》二卷，不但有二十篇未刻入，即刊入者也大加删削，被改动了不少，如《十过》，其正文被改成《十恶》。此本校勘价值不大。

以上五种版本最为主要；还有其他一些刻本，如凌瀛初本、王道焜本等，都不过是这些本子的翻刻本，校勘价值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有张敦仁（字古余）之影宋抄本。这抄本影抄十分认真，还经顾广圻复核过，最能体现宋本真迹，与吴蔚本、四部丛刊本之价值相仿，只是未经刊印，影响不大。现又属一级藏品，阅览须经馆长批准，甚为不便，所以至今也没有被校勘者所利用，这是十分可惜的。

校书除了版本之寻觅外，各种校释之作也值得参考，《韩非子》的校释之作，主要有：

一、日本松皋圆文化六年（1809）定稿之《定本韩非子纂闻》，昭和年间东京崇文院编印崇文丛书，此书刊于昭和三年（1928）至八年（1933），为崇文丛书第二辑第1至第9册以及第37册、第45册。刻印甚精，且汇校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王道焜本等，校改处多有可取，注释也颇详尽，还汇集了明代各家之评。

二、日本津田凤卿《韩非子解诂全书》，文化十四年（1817）刊，半千塾藏板。以王道焜本为底本，参校明代各种评本及清代翻刻本。虽亦未及“乾道本”，但其考校也颇有参考价值。

三、日本藤泽南岳《评释韩非子全书》明治十七年（1884）刊，青木嵩山堂藏板。此书问世稍晚，故汇集了诸家校说，足资参考。

四、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光绪丙申(1896)初刻，后世翻刻者甚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它“粗疏荒谬，不可究诘”，“以其微有抄撮之功，案头翻阅，未为不可，若以为精校之本，则大误矣。”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贬之过甚。平心而论，《集解》还是研究《韩非子》所必备的校释之作。

五、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韩非子读本》，行星社宣统二年(1910)九月铅印线装本。注释极略，但其中吴汝纶及其子吴闇生之校语也有可取之处。

六、尹桐阳《韩子新释》，1919年刊行。该书详于史地之考释而略于校勘。故于校勘可取之处不多。

七、陈启天《韩非子集释》，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校释较详，可资参考。

八、陈奇猷《韩非子集释》，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校释亦详，亦有所发明，实为研究《韩非子》者所必读。惜其校释多转抄自《校释》，并未用各种版本细加校勘，故失误不少，使用时当注意。

九、梁启雄《韩子浅解》，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为普及性读本。

十、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虽为普及性读本，但校释比较严谨，值得重视。当然，疏漏也在所难免。

十一、周钟灵等《韩非子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5月出版。校勘虽多承袭《韩非子校注》，但也有不同处，错误之处比《校注》还多。

以上是包容《韩非子》全文的校释之作。其他还有不少札记类校释之作也值得重视。主要有：

卢文弨《群书拾补》第二十六卷之《韩非子校正》抱经堂本。

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上》，今易见之善本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所影印的王氏家刻本。

顾广圻《韩非子识误》，附于吴鼎本《韩非子》后，可取者甚多。其中所引王渭的校语，也很有价值。

俞樾《诸子平议》第二十一卷之《韩非子平议》，光绪刊。

孙诒让《札记》卷七，光绪二十年刊。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中华书局1959年12月出版。

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三十六册之《韩非子商补》，宁武南氏1936年校印。

于省吾《双剑簃诸子新证》中有《双剑簃韩非子新证》四卷，北京大业印刷局1940年出版。

孙楷第《沧州后集》有附录《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原发表于1929年《北平图书馆月刊》三卷六期及1935年4月《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二期)，中华书局1985年8月出版。

高亨《诸子新笺》中有《韩非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1月第2版。

以上各种版本及著作，我皆见于上海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览甚为便利。这两馆还藏有其他一些《韩非子》的版本，但非主要，故略而不述焉。

(作者单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中文系。来稿时间：1990.4. 编发者：刘喜申。)

collectively by special agencies.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five other jobs that should be done well,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 for selecting words.

CN-MARC——Indexing

After-Control standard——Approaches

G254·39

The Origin of Series: Differentiation and Demonstration / Wang Zizhou//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17 (4) .-72~76

Those who hold a viewpoint much in vogue abou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series believe that the earliest on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book “A Keen Comprehension of Confucianism” (Ru Xue Jing Wu) (1202) collected by Yu Dingsun and Yu J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ctually, the system of series had already ripened into maturity during Qi and Liang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Books of Geography” (Di Li Shu) collected by Lu Cheng of the Southern Xiao Qi Dynasty (479–502) and the “Collection of Laws” (Fa Ji) compiled by Seng You of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502–557) all had achieved in the proper form of series. In actual practice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classifying and cataloging, it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to treat different books of same subject as series. This shows that people hold an identical view of understanding series, 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road sense and the narrow sense of it. To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narrow sense of series is to add to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series. And it is also not proper to cite the book “A Keen Comprehension of Confucianism” as the earliest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narrow sense of it.

Series——China

History of books——Studies

G256.1

An Afterword of Collating “Han Fei-Zi” / Zhang Jue//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77~82

It is highly commendable for collators of ancient books to collate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If the second-hand material is used, one will make mistakes without knowing it. The harmful practice in the collation circles of replac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 by the secondhand one is worthwhi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rticle has evaluate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some editions of “Han Fei-Zi”, e.g. Gu Guangqi’s “Han fei-Zi Shi Wu” (Mistakes Seen in Han Fei-Zi); Chen Qiyu’s “Han Fei-Zi Ji Shi (A Variorum of “Han Fei-Zi”) and Wang Xianshen’s “Han Fei-Zi Ji Jie” (A Variorum of “Han Fei-Zi”).

Rare books——Studies

“Han Fei-Zi”——Collations

G256.3

(周钰萍、张木早译，周钰萍校)